

(美)托德·吉特林(Todd Gitlin) 著

张 锐 译

胡正荣 校

新左派运动 的媒介镜像

THE WHOLE WORLD IS WATCHING

mass media in the making&unmaking of the new left

伯克利的社会学家托德·吉特林用细致的研究和极具穿透力的思考，解读了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学生运动和大众媒介之间的恩怨情仇



华夏出版社

(美)托德·吉特林(Todd Gitlin) 著

张 锐 译

胡正荣 校

新左派运动 的媒介镜像

the whole world is watching

mass media in the making & unmaking of the new left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左派运动的媒介镜像/(美)吉特林著;胡正荣,张锐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1

ISBN 978-7-5080-4111-7

I. 新… II. ①吉… ②胡… ③张… III. 传播媒介—研究—美国—现代 IV. G219.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48715 号

THE WHOLE WORLD IS WATCHING BY TODD GITLIN

© 1980 by The Regents o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01-2005-3379

新左派运动的媒介镜像

[美]吉特林 著

张 锐 译

胡正荣 审校

出版发行:华夏出版社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100028)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人卫印刷厂

版 次:2007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7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787×1092 1/16 开

印 张:16.25

字 数:291 千字

定 价:33.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伯克利社会学家托德·吉特林用细致的研究和极具穿透力的思考，解读了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学生运动和大众媒介之间的恩怨情仇。

《纽约时报》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对学生运动的报道如何抑扬褒贬；运动中公众人物的声誉如何与日俱增，又如何慢慢消散；暴力如何不断升级；媒体的选择如何影响60年代这场学生运动和社会政治变迁。

作者托德·吉特林曾经参与了当时的报道，他不但目睹了媒体是如何歪曲报道的，而且还看到了学生运动自身复杂的结局。

策划和海外联系人：潘忠党

主 编：黄 旦

副主编：陆 晔

编委会成员（以姓氏笔划为序）

石义彬 孙五三 陈力丹 吴予敏 陆 晔

何道宽 胡正荣 展 江 龚文庠 黄 旦 程曼丽

致 谢

在一个社会中，我们感到著书立说总是会得到许多的恩惠，得到许多帮助，是一种于历史环境之中的进展。本书中的观点虽然源于作者本人，但无论是言及结论的推断还是对现象的批评，它们都直接或间接地来自许多人关于文化和政治的著作和言论。

我要特别感谢接受我采访的前“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成员和一些反战工作者，他们分别是迈克·戴维斯、R. G. 戴维斯、道格拉斯·多德、尼克·埃格尔森、丹尼尔·埃尔斯伯格、理查德·弗莱克斯、海伦·赫伯、戴维德·霍克、格伦·赫希奇、迈克·克莱尔、迈克·勒恩、肯·麦克埃得尼、詹姆士·罗素、玛丽娅·维拉以及苏珊·韦伯。

同时我还要感谢向我提供许多宝贵资料的媒体工作人员：《纽约时报》的劳伦斯·本斯基、弗莱德·波利奇、柯克帕特里克·塞尔和丹尼尔·斯沃茨；《旧金山纪事报》的亚当·霍斯查尔德；美国广播公司和KQED公共电视台的凯洛琳·克蕾温；还有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现任和前任的记者、制片人和其他工作人员，他们分别是罗斯·本斯利、朗·伯恩、布莱尔·克拉克、路易斯·克温、斯坦霍普·古尔德、玛丽·霍兰、亚历山大·肯德里克、斯蒂芬·莱特希尔、迈克·诺兰、森塞·萨默尔和丹尼尔·斯霍。他们在记录历史时，即便是面对许多困难和窘境也显得十分雍容闲雅，就像许多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纽约时报》的工作人员有时候倾向于在报道的最后不署上自己的名字一样。

在我的思想和描写中，还有许多令人愉快的事情，感谢托马斯·布鲁克斯、克尼·布朗、保罗·克温、里切·克温、琼·克鲁茨、汤姆·恩格尔哈德特、南希·盖瑞特、蒂默·海特、卡罗·海奇、劳伦娜·凯恩、莱奥·劳温、特里·伦斯弗德、戴维德·马特查、马克·奥塞尔、弗朗斯·弗克斯、我的母亲杜瑞·瑞尼克，还有帕梅拉·罗比、尼尔·塞梅斯、芭芭拉·斯帕克、戴维德·威尔曼和保罗·威利斯。同时还要感谢一些对书稿进行了阅读和评注的人，他们是保罗·

布思、格瑞·卡尔弗特、大卫·戴林、罗伯特·格特里伯和丹尼尔·海琳，其中丹尼尔·海琳还为我提供了她在万德比尔特大学（Vanderbilt University）和国家档案馆收集的电视新闻资料。罗伯特·伍斯诺对整部书稿做出了具有真知灼见的评注。罗伯特·罗斯对于本书第三部分的修改给予了重要的帮助，书中的注释也记录了其他许多人的智力劳动。无须多言，任何人都不应该为本书中我自己的个人之见受到批评和指责。

格伦·赫希奇为我提供了许多线索，做了许多文献的研究，并且还打印了部分前期手稿。伊瑞斯·罗森伯格在纽约对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报道做了许多后续工作。玛琳·伯森是我的研究助手，记录了许多关于反对核武器和核运动的文章，并且对其做了精辟的分析。帕梅拉·埃利斯和玛格丽特·欧克利打印了早期文章的定稿。欧内斯特·卡伦贝奇编辑也提供了许多支持和帮助，在此我也要一并表示感谢。

拉瑞斯基金会和国家发展委员会资助了我在纽约对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报道的研究，并且为我提供了许多对最终的著作有所帮助的材料。在种族与社会关系学院的研究经历使我有时间完成我的博士论文，本书也是在此基础上最终形成的。真诚地感谢玛丽·安娜和特伊·杜斯特，还要谢谢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研究委员会为本书提供的内容修改以及补充的研究费用。我的学位论文指导委员会的成员在我的写作进展举步维艰时总是给我以鼓励，我要向埃利·霍斯查尔德、保罗·罗金致以最深的谢意。尤其是威廉·克恩霍斯，没有他对我不断的鼓励，这本书是无法完成的。

在几次修改了书稿之后，这本书的作者也和其他人一样，或多或少地将此视为一部平淡之作。从修订的角度来看，一个人总是想拥有理想的读者和批评，他们细心敏感并且能够抓住原作的意图，或许比作者有着更为清晰的认识；他们博学聪颖，能够提出震撼性的有力论断；他们希望语言能够清晰明朗。在本书最后一次的修改中，我得到了克莱尔·斯派克这位读者非常宝贵的帮助，她逐字逐句地阅读了原稿，在许多地方提出了富有见地的意见，并且我们一起工作时通过长时间的交谈来不断地沟通，她的洞察力自始至终都得到了体现。我非常激动，也非常感谢她的慷慨和给予。

序 言

我怀着一种复杂心情完成了这本书，这种心情实在不可言宣。想象一下，当你感到别人眼中的你和真实的你根本就不是一回事，或者别人认为这样的事情你却认为是那样的时候，这将是一种怎样的感觉呢？对于公众来说，这种不可名状的感觉已经成为他们对于媒介形象的一种普遍体验。

在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许多人都逐渐认识到，大众媒体是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尽管并不十分清楚这种力量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政治力量。单就媒体的作用而言，部分是显而易见的。报纸刊登的报道谴责肆无忌惮的警察对民众非暴力行为的猛烈摧残，同时还利用骇人听闻的图片向人们传达更多的信息。有时，媒体的作用也并非那样明显。乍看来，电视在某种程度上似乎真的对越战产生了影响，纽约电视评论家迈克·阿伦（Michael Arlen）将越战期间的报道形容为一场“直播间的战斗”。那么，在这场战争中，无论电视是否展现了一个真实的世界，是否真的扮演了某种角色？战争最初的迅速蔓延，以及随后的衰退是否都受到了这种影响呢？1960 年，在电视媒介光辉的照耀下，肯尼迪击败了对手尼克松当选为美国总统，尽管在这之前，人们对电视的作用仍颇有微词。八年之后，又是在这种疑问下，尼克松靠着在电视上推销自己的广告击败了休伯特·汉弗莱（Hubert Humphrey）〔见约·麦克吉尼斯（Joe McGinniss）一本销量不错的书——《总统的推销》（The Selling of the President）〕。

在随后的几年里，无论是挺战分子、反战分子，还是各种各样的政治党派，都逐渐意识到，大众媒体的光环将社会事件染上了不同的色彩；媒体围绕在它们的周围，不管这意味着什么，但绝不可忽视。1968 年 8 月，数以千计的警察、军队以及国民警卫队的人员严阵以待，而游行示威者则冲着摄像机的镜头大声喊道“全世界都在看！”，仿佛是在混乱中找到了救命稻草一样。右翼势力认为电视淡化了暴力行径，而好战分子则指责电视怀有敌意，并开始将记者拒之门外。媒体的报道是否真的有所夸大，或者保护了某一方的利益呢，亦或是其他？无论如

何，新闻业的基本规则——尤其是声情并茂的电视媒介——用从业人员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并非是单纯反应现实的一面镜子”。至少它是建构现实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并进入了我们的思考——我们是谁，我们又在做着什么。早些时候我就曾发现，大多数的运动实际上并不具有多少新闻价值；或者，即便真的进入了媒体的视野，也是牵强附会，甚至沦为笑料。1968年到1969的冬天，我开始强烈地意识到，媒体的报道不但会扭曲真相，而且还会无中生有，捏造事实。

在学生开展反战运动期间，我曾为旧金山附近的一些“地下报纸”当过自由撰稿人。当时，我从一名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德才兼备的记者口中得知，总部设在纽约的电视网曾经为了修改一篇报道的政治言辞，而责令让该篇报道翻工。尽管对于新闻报道来说，这简直就是家常便饭，而且并不能完全代表媒介具体的运作，但总让我感到有丝异样。为什么媒体要以如此方式来进行表达呢？为什么媒体的报道会干预这件事而不是其他别的事情呢？要想回答这些问题，仅仅用“媒介是权力机构”，或者“这就是权力机构的运作”等等子曰诗云是远远不够的。我也涉猎过一些有关文化研究和媒介理论方面的著作，但对于我所思考的问题，帮助却微乎其微。而一些已经出版的相关著作，也无法让我理想地把握电视媒体对于越战的报道。对诸如新左派运动这样的政治运动，一些学者的看法也是影影绰绰——运动的内部生活、革命意识，更不用说无意识的层面以及媒体是如何具体报道的了。

70年代中期，我决定将这些问题拿到毕业论文中来讨论。而且我认为，此时是我人生的一个关键时期，我可以解决这些问题。当时还没有真正对于媒介属性问题的研究，尽管美国学者并没有将媒体作为一种政治力量给予过多的关注，而且这种关注难免流于肤浅，但这毕竟是一个开始。整体而言，大部分的研究都是立足于大众媒体是如何制造我们对于现实的感知上的。大多数观点认为，大众媒体的影像和叙述并不是完全和现实世界一致的，这并非源于媒体本身所具有的宣传属性，也不是因为同其他行业相比，媒介无法摆脱的虚词诡说。现代大众媒体不断地被加以操纵，用来制造陈词滥调。最为重要的是，媒体机构都有自己的想法和打算。记者们并不是自由漂浮的真理追求者，有时也会犯错误，甚至会干出一些非常糟糕的事情来。他们编织出对于世界的认识——并非用心险恶，而是和《纽约时报》“刊登一切适合刊登的新闻（All the News That's Fit to Print）”以及CBS新闻的“事情就是这样（the way it is）”截然不同的一种方式，或许是解释性的，或许是公正的，亦或是极具穿透力的。但是，他们对于世界的看法绝对不是直接来自于上帝。因此，对于宣称“事情就是这样”的新闻机构而言，即便是

被扭曲的问题也只是一个小小的前奏。当它们与工作人员产生分歧，或者高层主管人员回应权力机构的管制时，对它们来说，什么才是有用的呢？

震惊不仅仅是一种认知的体验。想象一下，假如许多素昧平生的人对你知道得一清二楚，而且他们对你的理解并非真正的你，甚至恰恰相反。不管你走到哪儿，人们总是这样那样地盯着你，而你也无法摆脱在他人心中的形象。当你走进酒吧抬起头来，大伙多多少少都会知道一些你的事情，这种身份的扭曲似乎有点种族歧视的味道。更为不幸的是，你被完全地暴露——一个你想象中的你。

“欢迎来到这个世界”，或许你会有如此的想法。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你内心的生活难免会有些暗淡，或许这就是需要付出的代价。如果你确信你的内心世界确实很重要，你将体会到，真实的你和想象中的你二者之间的矛盾就如同一个窃贼一般，偷走了你自己。事实上，这种矛盾在现代生活中早已存在，并非刚刚开始。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德国社会学家乔治·齐美尔（George Simmel）强调了主体文化（subjective culture）和客体文化（objective culture）的区别。同样，在“主格的我”（I，我认为的“我”）和“宾格的我”（Me，别人认为的“我”）之间也存在着内在的张力。尽管齐美尔并没有对媒介做出多少分析，但他对当代世界——一个仍然是我们赖以生存的世界——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内心感受与外部关系之间的隔阂，是现代社会众所周知的状态。但是，你自己的生活——你所认为的生活，你自己理解的生活——是一种政治上的生活。围绕着你活动所散发出的各种形象，构成了你个人的意义所在，也决定了你何以为你。它们进入了你的感知并得到理解，重写你的行动。其中必定会有什么后果，或许是难以控制的。

当我开始执笔本书时，我仍深陷于一种后六十年代唯理论的偏见，这种偏见始于对堕落思想的厌恶，并且随着溯及以往的乐观主义而不断蔓延。在这种乐观主义视野下，定会有相当多的人对运动倒屣相迎，而且运动会在未来的几年、几十年的时间里创造一个健康的政治气候。我想这只是我的一个愿望，并不仅仅因为它忽视了运动的内在动力。即使是再为苛刻的批评，也不会否认媒体对于意识形态的重要影响——人们对此已习以为常，不管是对于民主、战争还是其他事情的态度。现在，我倾向于这样一种认识：在大多数历史时期的大多数社会中，大多数人对现实社会的认识是流于褊狭的，这并非是危言耸听。我如此认为，并切身体会到，媒介不仅影响了人们思考的模式，而且还影响了人们对于现实的感受（这是我在 2002 年完成的一本书中所讨论的问题，这本书是《Media Unlimited: How the Torrent of Images and Sounds Overwhelms Our Lives》）。人们借助于大众媒介来获得情感体验，体验媒介正在讲述的故事，并通过对这种体验来获得对于世界

的认识。这就是当被烧毁的旗帜的影像出现时，为什么会引起我们如此强烈的反应——因为它从我们的思想面前闪过，和我们的生活发生了碰撞。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不管媒体对于事实有所夸大，还是有所保守，它已经越来越多地参与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和行为之中。在扮演促进政治觉醒的角色上，媒体已不再显得那么重要，而更多地成为能够替代政治觉醒本身的事物。或许这些可以解释，为什么直到今天，我对于本书第三部分提到的“理论”仍然没有多少兴趣（还有其他一些“理论”）。“霸权”，通常被认为是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敌对，而我却觉得它是一个描述某种复杂过程令人生厌的概念。不过，这只是它的部分缺陷。它不足以深刻地触及人们现实中的问题，也无法抓住对于我们这个时代不可思议却又是木本水源的东西：媒介影响下的生活本质。直到今天，所有的运动（或许是所有的政治）面临的一个决定性的因素便是对大众媒介的依赖。

本书同读者见面已经有 20 多年的时间了，在这期间，不可避免地又发生了很多事情。那么，是什么改变了媒体的运作以及它对政治运动的影响呢？或者更重要的是，大众媒介在政治中究竟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呢？

一些事情是永远也无法改变的。新闻报道对于一些事情不以为然，视为草芥。就像 1999 年底，它们在抗议 WTO 西雅图部长会议中所表现出的那样。而在这之后的一些全球性的领导人和机构参与的事件中，比如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事件以及八国首脑会议等，有许多星巴克咖啡店的玻璃被众多的“无政府主义者（anarchists）”砸得粉碎，这丝毫没有得到媒体的关注；而数以千计的示威游行者媒体眼中也微不足道，或者就是一场和平的行动。

尽管媒介本身不像 60 年代的时候那么集中，这仍然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媒介的融合、电视多频道的出现以及观众的分众化趋势，并没有改变媒介所有权的日益集中。同时，互联网的出现为开发分散的市场提供了可能，就像在西雅图事件中所表现出的一样，电视节目的适位（niche）已是发展的必然要求。电视新闻对美国人已经不再那么重要，年轻人更多地将收看晚间的娱乐节目作为他们的信息来源。而且，对于电视观众或者广播听众来说，可以更容易得到各种各样的新闻。整体上的新闻已经缩小成为附属事件，但这并不意味着新闻不重要。

主流媒体不再像以往那样发出如此强烈的声音，但是新闻报道的有些东西是永远也不会改变的。当政治精英们达成一致时（比如 1990 年的沙漠风暴以及 2001 年的反恐行动），媒体便会百依百顺。而当这些政治精英们存在分歧时，媒体又显得阳奉阴违，不时提出尖锐的问题——政府对于媒介的管制，尤其是五角大楼，比起 60 年代来要聪明得多。当媒体发现政府已经失去或正在失去其自身合

法性的时候，也仅仅是在这个时候，它便会摆出咄咄逼人的攻势，就像1986年在里根中期大选后的“伊朗门”事件以及2001-2002年美国大公司的一系列丑闻事件中所表现出的那样。媒体仍然会就有关国家重大事件向政府抛出问题，而不是答案。不过，当民主党人士集结于政府的时候，情况却发生了变化。尽管已是明日黄花的右翼分子一再声称“自由派偏见（liberal bias）”，但是媒体对克林顿和希拉里气势恢弘的口诛笔伐到头来并没有怎么有所作为，反而成了对白宫性丑闻的敲诈和对总统实施弹劾的要求，就像它们在“白水事件（Whitewater）”中遇到的困扰一样。在克林顿入主白宫的八年中，从来没有一个电台的记者像拉什·林堡（Rush Limbaugh）那样，对克林顿大大小小的事情大张挞伐。也没有像右翼共和党人士帕特·布坎南（Pat Buchanan）或者默多克的福克斯新闻频道所表现出的那样，不断地和克林顿大唱对台戏。

除了媒介之外，还有许多的因素影响了人们接受既有的社会秩序，社会分析家们不该对此有所遗忘。但是，媒介是否确保了既有秩序的稳固仍值得怀疑。今天，怀疑论（skepticism）和唯智论（knowingness）如此盛行，令人感到惊讶。所有的权威，包括媒介权威，都对媒体在越战、60年代的政治运动和水门事件以及随后推动历史进程的事件中的表现感到震惊，他们还没有改变以前的眼光。无论是教皇还是总统，都没有再赢回他们头上的光环，就连公司的CEO们也难免搁浅。新闻业——或者其主张——也受到了怀疑论的影响，变得畏缩不前。现在普遍认为，新闻并非所谓的“事实就是如此”，而是现实的一种反映，一种没有停止的反映。

最后，我无意说明所有的著作实际上都是不值一读的，姑且让我来说一说一部真正不值得一读的作品。一些读者将本书看成是一本批评媒介机器单纯地对运动进行摧残并且维护反对者谎言的著作。我试图避免令这本书成为莫尼教（Manichaean）情节剧之类的作品，而力图展现人类的多种成就，并寻找人们的所思所想。如果我的怨愤满足了我的愿望，我希望它们没有掩盖社会分析家们的光辉。在这本书的再度写作过程中，我的一个编辑，名叫内斯特·卡伦巴彻（Ernest Callenbach），曾提醒我从尚·雷诺的“每个人都有他的道理”中得到启发。事实上，在历史的逆流中，几乎很少有什么事情没有其自身存在的原因。尽管我站在运动一边，我不会也不愿宣称新左派是完美无瑕的，或者是善始善终的。对于新左派运动而言，无论如何都无法完全摆脱内部和外部的羁绊。正如我在第四章、第五章以及第六章讨论过的那样，运动对于权威和暴力的矛盾心理、与大众文化的区别、对名誉的热衷以及其自身学生运动的属性，都说明了这一点。另外，政

治力量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或许读者会发现，许多主题都围绕着媒介来展开，而且我绕开了主题提到了一些和媒介无关的事情，比如林登·约翰逊灾难沉重的越南政策以及尼克松的诡计。

在随后的一些著作中，我涉及到了更多的问题。坦白地讲，本书绝不是我对于60年代的由衷之言。在这本书出版后几年，我又出版了 *Years of Hope, Days of Rage*，对60年代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在我看来，本书对60年代的学生运动提出了很多尖锐的问题，这只是一个开始，远非终结。媒介和运动共同演绎的历史不失为一个框架，不仅仅本书是60年代的一个框架，正如我想表达的一样，或许读者已经能够领悟其中的含义——这本书不仅回顾了那段特定的历史时期，更对媒介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做了进一步的考量。

导 言

本书是一本关于大众媒介和新左派（the New Left）的著作，主要追溯了20世纪60年代大众媒介与新左派运动的历史，考察了二者在历史时空中的复杂关系。同时也讲述了在一个无处不渗透着大众媒介的社会中，公共文化领域控制下的一次重大冲突。

自从半个多世纪前广播媒介问世之后，社会运动也得以自我组织和发展，并在整个社会领域中找到自己的身份认同。媒介对于社会经济的关注以及传播事件和报道新闻的时效及功能，使得社会运动在试图改变既有社会秩序，同时日新月异，尽管社会运动、大众媒介以及有关社会学的相关研究在寻求现代文化语境的意义时多少显得有些步履蹒跚。

对于大多数人而言，信仰和忠诚深深地植根于传统，只有少数的经验直接来源于社会现实。而现在，整个社会的情形却是屈从于惑众流言、媒体报道、大众潮流以及社会时尚的一种普遍性脆弱：传统价值观守护的匮乏以及对于政治权力的热衷。在一个日益模糊与不确定的世界里，人们越来越多地依赖于大众媒介来寻找并试图发现自我。而且，大众媒介本身的传播也背道而驰：说服性的大众媒介不断消解着政治社群（political community），籍此来增加人们对其的依赖。同时，大众媒介也将一个机械的公共空间带入了私人领域。在生存世界的裂缝中，为了获取概念、英雄人物的形象、信息、情感诉求、公共价值的认同以及通常的符号，甚至语言，人们发现自己已经越来越多地依赖于大众媒介。在现实生活中，它们无时无刻不在为人们编织着信仰、价值和集体认同——通过其颇具说服性的美德、平易近人的亲和力 and 位居中心的象征力量。它们对这个世界做出各种解释并宣称事实何以为事实，而当这些宣称受到怀疑和指责时，它们又会用同样的宣称来压制积极的立场。简而言之，大众媒介已经成为支配意识形态的核心体系。

言外之意也就是，大众媒介每天都在用语言图像、娱乐、新闻以及广告来建构概念与想象，通过这种方式来表现并明确意识形态，不管这种方式是直接的还

是间接的，亦或直陈其意还是借助于晦涩的隐喻。对于意识形态而言，一个重要的职责便是对其反对势力的界定。当然，大多数情况下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大众媒介的广泛和集中以及与主流经济和政治力量的结合却为反对势力制造了一个新的境遇。有别于19世纪90年代的“民粹主义小农场主运动”（the Populist small farmers' movement）和20世纪初的工人社会主义政党（the worker-based Socialist Party），60年代的新左派运动处于一个完全不同的文化世界中。“民粹主义小农场运动”拥有自己1,500份发行量的周报，工人社会主义政党的报纸也有数百万的发行量，而新左派运动面对的则是晚间电视新闻、通讯社报道以及新闻从业者对于“客观（objectivity）”的解释。60年代，统治美国社会的是公司经济，而不像以前那样显得乳臭未干。在弥漫着战争气息的国度里，“天命观”（Manifest Destiny）也逐渐开始变得现实起来。令人惊讶的是，美国是世界上首个大学生人数超过农民人数的国家。而激进反对派的社会构成，也相应地由小农场主和移民工人转向了黑人、学生、青年和妇女，改变的不仅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主导性结构，更重要的是其本质特征（texture）。政治运动的整个性质（quality）、过程（procedures）、基调（tones）以及文化承诺（cultural commitments）都发生了变化。面对庞大的文化工业，政治运动必须对其有所考虑——或者行走于其边缘，或者迂回于其缝隙，或者予以反对。如同先驱者的“民粹主义小农场主运动”以及社会主义政党，“新左派”运动也拥有自己的“地下（underground）”报纸和数以万计的读者。但是，每天晚上却有2,000万的美国观众收看沃尔特·克朗凯特（Walter Cronkite）、杰特·亨特利（Chet Huntley）以及大卫·布林克利（David Brinkley）的新闻节目。而消息主要来自于世界两大通讯社的日报，则拥有近6,000万的读者。对于反抗运动而言，在一个社会的主流文化之外来解释自身和其世界观，并建立能够自我生成文化制度的文化基础是极其困难的，甚至是根本不可想象的^①。的确，在一个商业文化位居主导的社会，建构意义的难度可以和借助于劳动力创造价值相提并论。正如“工人（workers）”意义层面上的人们在做什么和怎样做以及产品是如何分配和使用上无法倾听到自己的声音一样，“意义生产者（producers of meaning）”层面上的人们也无法确信大众媒介是如何制造他们的言论和行动的。经过设定后的意义在现实中变得荒诞怪异，并不断远离虚假的制造者甚至将它们视为异己，而蓄意性行为的社会意义也超出了原有的认知，遭到扭曲。

① 这是Walter Adamson提出的观点，见“Beyond Reform and Revolution: Notes on Political Education in Gramsci, Habermas and Arendt”，*Theory and Society* 6（November 1978）：429-460。

在20世纪后期,为了昭示自我并且表明它们想对公众做些什么或是想支配些什么,政治运动开始依赖于大规模的传播。不过,在该过程中,对于何为“有新闻价值的(newsworthy)”事件,政治运动只是对照新闻含蓄的定义照本宣科地加以理解,或者模仿新闻工作者的准则来形成对何为“报道(story)”,何为“事件(event)”以及何为“反对(protest)”的认识,对于广大公众和文化制度而言,他们缺少可具选择的信息来源,甚至根本没有。在这种情形下,大众媒介所宣扬的形象逐渐演变成了所谓的“政治运动”。于是,这种形象便对公共政策产生了影响。而当运动遭到反对时,真正遭到反对的大多却是这套大众媒介所宣扬的形象。大众媒介通过消除并努力将这种影响降低到最小程度来界定运动事件的公共意义。相对于运动的真正面目而言,媒体所传播的形象显得愈加模糊与晦涩,媒介关注的是领导者(leaders)和显要的官方“人物(personalities)”。事实上,他们可以将领导人变成“公众人物(celebrity)”,一种与众不同的身份。于是,报道的形式便形成了一种系统性框架(systematic framing),而这种往往被扩大的系统性框架决定了政治运动的命运。

运动被界定为“真实的拷贝(good copy)”经常是绚丽多姿的,或者是因为媒体所宣称的公众人物—领导人(celebrity-leader)的出现,或者是同新闻从业者视野中的“报道”相互吻合;但这些形象的本质并非运动本身的计划、身份和目的等初衷所在。然而,当它们限定并扭曲了运动本身时,媒体却往往夸大了对于这些运动的话题。正如我在本书第三部分中所讨论的那样,它们在国家和社会中将丑闻散布出来,通过适时对合法权利建构权威来纠正错误。自由的媒介悄然唤起变革的需要,但却蔑视那些要求对现有社会制度进行改革的政治运动。

新闻业的惯例是以新闻组织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兴趣为基础的,往往从对各种社会现实的筛选中得到体现。日复一日,常规的组织程序界定了“报道”,塑造了领导人以及他们所持的观点,并且传达了该如何认识领导人的态度。只有在政治危机或起主导作用的意识形态出现较大变化的时候,政治经济领导才会偶尔直接介入或干涉现行的新闻惯例。但大多数情况下,想当然的“客观性(objectivity)”和“平衡(balance)”准则迫使记者们去寻找那些扛着旗帜、看起来粗俗却又吸引人的示威游行,使他们与听起来似乎合情合理、事实确凿的官方保持对立。冷静而又谨慎的论调确保了“骚乱(disturbance)”应当得到官方的合理控制。“骚乱”这样的字眼赞扬了既有的规范;摄像机拍摄的角度和新闻业业界行话(比如“事情就是这样”)确保了新闻主持人的完整和权威,表明了既有秩序存在的必然。言外之意就是,无知愚昧的人被蒙在鼓里;而那些聪明人,比如政

府官员还有记者们，却保持着难以想象的镇定，守在旁边等着看好戏。

然而，这些传统是随着历史产生、发展并改变的。新闻的生产并不是自我封闭的；出于商业因素和职业操守，新闻业不能对于意识形态重大的变化有所忽视。往日没有得到关注或者是作为取笑对象的疯子会成为今天受人尊敬的“积极的消费者”。与此同时，媒介视野中60年代迷惘的形象也无法和70年代懒散、冷漠、自我满足的形象相提并论。1971年，昔日著名的“芝加哥七人团体（Chicago Seven）”中的革命先驱约翰·弗罗尼斯（John Froines）来到了华盛顿声讨政府。可到了1977年，他却高薪供职于华盛顿的政府部门。就在同一年，马克·鲁德（Mark Rudd）从“气象员地下组织”（Weather Underground）中崭露头角。在对马克·鲁德的父亲进行报道时，就30岁这个年龄对于革命事业是否已经略显年迈的问题，沃尔特·克朗凯特（Walter Cronkite）深有同感地露出了微笑——这些都是当时冷静、理智的时代中广泛宣传的形象。同时，公共事业进度改革运动、南部的一体化运动、全面就业运动、反对军备运动、反核武器运动等并非由“公认的领导者（recognized leaders）”（被媒体选出来作为公众人物）发动的运动超越了现行模式（“新左派死了”，“美国正转向右派”）——通常它们是要被忽视或遭到诋毁的——直到这种现行模式发生改变（如它们在三哩岛 Three Mile Island 事件中所表现的那样）。1978年5月，在科罗拉多的洛基弗拉茨工厂（Rocky Flats）发起了一系列的示威，示威主要反对一家为美国氢弹生产钚触发器的工厂。随后，一位反对核武器的人士获准释放。他打电话给《纽约时报》华盛顿总部的一个编辑，询问该报是否报道过在示威中部分工人遭到拘捕的事情。该编辑对此予以否认，而且补充说：“美国厌倦了抗议，美国厌倦了丹尼尔·埃尔斯伯格（Daniel Ellsberg）。”就这样，蒙蔽大众终于无法避免；编辑或执行审查人员将他们的篡改合理化，并谦逊诡秘地将其奉献给愚昧而又趋于同质的受众，这正如心地善良的牧羊人认为新闻评审合情合理一样。内容越是接近国家政治精英们的核心利益，这种挑战就越有可能会遭到管制，也就越不容易公之于众。国家核武器项目的核心问题是安全问题；因此关于核武器会带来威胁的报道要想通过审查自然是难上加难——这种难度远非我们可以想象，而是难于登天，正如三哩岛事件后的相关新闻报道。但是，如果问题在精英层中发生了争论，新闻准则更为惯用的手法是更多地处理来自社会上的反对意见，进而控制事件及其影响，并按自己的意图进行传播，尽其所能将其纳入社会的主导结构中，将其余的部分推向社会生活的边缘。

因此，经过加工处理过的信息变得愈加复杂。我们以其中的一个新闻题材为例：1976年5月8日，在CBS的《晚间新闻》节目中，丹·拉瑟（Dan Rather）